

论“诗骚传统”

韩高年

内容提要 文献典籍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载体,《诗》为“五经”之首,而《楚辞》为“集部”之首。这种古籍归类和传承的特殊性,使《诗经》《楚辞》与后世文学形成很强很密的文本上的“互文性”。由此,笔者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这就是形成于先秦时期的“诗骚传统”。在它形成后,就成为影响历代作家创作和人格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以及批评家衡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品位的基本标准。

关键词 诗骚传统; 形成; 内涵; 影响

有人说,西方文学的根脉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而其文学传统是由其开创的“叙事传统”;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代代承传,其中有没有一个核心的“精神传统”?如果有,这个传统是什么?形成于何时?如何形成?其内涵是什么?这是文学史研究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很可惜,研究者们多关注于一朝一代作家和作品,而忽略了对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本文想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今天,消费主义浪潮正深刻地改变着“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学的“传统”面临被颠覆和解构的困境。^①因此,着力揭示“诗骚传统”的价值内涵,寻找其与当代文学与文化需求的契合点,也不失为弘扬这一优秀传统的一种策略。

一 “诗骚传统”的形成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②,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经》收录商代^③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结集于春秋中叶。《楚辞》虽结集于屈原既死之后,然而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些作品在屈原在世时即已在楚地广为流传。在屈原身后,更成为敬仰屈原的作家心慕手追的经典。这两部诗集,在先秦时期即因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典范

作用而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由重儒的政治思想导致的文官制度和相应的人才选拔制度,使《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均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对《诗》《骚》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骚》虽然并称,但二者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但却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周颂》和《大雅》之分诗,或为祭祖之颂歌,或为畿田礼之乐歌,或为《武》乐之歌辞,或为冠礼之祝辞,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为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入《诗》文本。《周颂》和大、小《雅》仪式乐歌事关礼乐制度,后一类讽谏和颂美之诗则体现了理智的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呈现。《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其中《九歌》《招魂》《天问》带有浓厚的楚地巫教文化气息,神秘而浪漫。《离骚》《九章》等作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使二者比

肩互补,具备了典范和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是《诗》《骚》的经典化。事实上,《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晚近学者据《诗》文本内部和其它先秦典籍所载的外部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其中专为开国典礼、籍田礼、成王冠礼等重要仪式而创作的《周颂》31首,以及大、小《雅》中与祭祖等仪式关系密切的组诗结集最早,大约在西周中期穆王时代之前即已出现^④;为讽刺时政而作的二《雅》中的讽刺诗大约结集于西周末东周初年,而大部分的《风》诗则在春秋早期的近百年间进入《诗》的文本系统。^⑤以上三类诗歌进入《诗》文本,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颂》的编辑体现了周初社会对礼乐实践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的《诗》文本类似于礼典,在行礼时以之为据,照章办事。二《雅》编辑则体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人的较为复杂的政治思想,燕饮诗的编辑体现了周人旨在收拾人心的“和同”的政治思想。政治讽刺诗进入《诗》文本,则是由于周人讽刺时政、匡正其弊端的实用政治理念与文学思想。风诗的依次进入《诗》文本,则体现了春秋时期王室与诸侯及诸侯与诸侯之间新型的政治关系,以及观风俗、知得失的诗学观念。《诗》的文本化和经典化总是与特定的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是以事件(event)的面目出现的^⑥,其经典化的路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生成规律。由此来看,《诗》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诗》文本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诗》与《书》、礼、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兴、观、群、怨,以《诗》观志,以《诗》观礼造士,《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

文化资源。这标志着《诗》已被经典化了,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离骚》等作所创造的“发愤抒情”的人生悲剧的消解方式。产生于战国末期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骚,是在继承楚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诗》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离骚》在体式上的富于变化使之容量大大增加,表现技巧异常丰富,遂使之超越了《诗》而受后世文人的重视。李泽厚说:“《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不可比拟的典范。”^⑦王逸《楚辞章句》将屈原的所有作品称之为《离骚》,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单列“骚”体,收屈子《离骚》《九歌》等作,都表明《离骚》一篇足以代表楚辞的重要地位。

同时,屈原的出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战国以前,虽然已有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但由于文学自身还处在与其它意识形态门类混而未分的阶段,带有浓重的群体性特征,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以诗歌创作和文学实践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也很少有集中体现作家诗人人格和生命体验的作品^⑧。屈原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他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

在春秋时代和屈原生活的时代,叔孙豹、子产、老子、庄子和孔子、荀子等思想家已经深入地思考过上述问题,并在他们的谈话记录和著作中对此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其中鲁君子叔孙豹的“三不朽”思想,孔子以礼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道家尤其是庄子努力开拓所谓“逍遥”的自由精神境界,注重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生活可能性的终极关怀的方式,都对屈原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⑨。楚文化注重个性、富于浪漫情调的特点使之更多地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个体生存状态的展现和精神世界的苦

闷与心灵感悟的抒写方面。屈原的贡献在于，他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实践了先贤时哲追求可能生活的精神指向。因此《离骚》造就了关注个体命运的独特方式——以“发愤抒情”升华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悲剧^⑩。朱光潜先生指出：“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⑪《文心雕龙·辨骚》篇认为屈原“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认为楚辞具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这些都是“同于风雅者也”。在他的心目之中，骚体不仅就是战国时代的风雅，而且还进一步为风雅注入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因此，在屈原之后，《诗》《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存哲学的传统。

二 “诗骚传统”的意义构成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传统的意义，也具有尚古的传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笃信古代文化，因此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而作《春秋》，编辑整理古代典籍。汉代倡导“奉天法古”^⑫，儒家经典成为为政为文之准则。刘向父子于汉成帝时率领群儒典校汉朝中秘藏书，对先秦至西汉的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区分天下学术，论各派得失，开启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宝贵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鼎盛，整理前代典籍，编纂文学总集、选集，仍蔚然成风。刘勰著《文心雕龙》力主为文宜“宗经”，强调经典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这种信而好古、取法前人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深厚的心理积淀深刻地影响到历代文人的创作，使其写作活动本身成为一种在继承前提下的创新，具有互文性的特征。与此相应，从秦汉时代开始，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信而好古的传统也在文学创作方面形成了以引证取资、阐释创新为特点的重视经典的创作心理。

《诗》《骚》在其被接受与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殊的文化的、文学的、哲学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意义构成层面。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它成为一种文化与文学传统，在意义构成上至少有下述几个层面：

第一，文学层面。《诗》《骚》历来被奉为古代抒情文学的两大源头，主要从诗歌创作方法、体式风格与诗学批评等多个方面对后世诗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历代诗赋：“源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钟嵘《诗品》言：“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并将五言诗之源溯至国风、小雅、楚辞，尤以风、骚为主。《世说新语》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亦言：“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⑬强调汉世以来诸家在文学体式与创作技法方面对《诗》《骚》的追慕与取法。而檀道鸾批评正始以来诗歌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甚。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⑭也是以“《诗》《骚》之体”作为评价的标准。再如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批评当时“京师文体，儒钝异常”的弊端，并分析其成因是“既殊比兴，正背风骚”，强调时文与“风骚”相背。^⑮此处所言“风骚”略同于“《诗》《骚》”，均指诗歌关注现实，长于比兴，有所寄托的传统。裴子野的《雕虫论》亦云：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揜落六艺，吟咏性情。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⑯

可见在诗歌创作内容上、形式上均出现新变的南朝时期，虽然游仙诗、玄言诗、永明体等成为一时好尚，但仍有一些作家能自觉地把“《诗》《骚》之体”作为纠正文学创作中远离现实或一味追求华丽语言形式之风气的批评利器。

隋代至唐初，虽因反对六朝骈俪华美之文风而有扬《诗》抑《骚》的倾向，但从中唐以后，仍是《诗》《骚》并重。李白在创作中化用骚体，杜甫曾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柳宗元也有拟骚之作。取法《诗》《骚》，几乎是诗人们的共识。金

元之际的元好问，编选《唐诗鼓吹》十卷，又有《论诗绝句》三十首，评论唐宋诗人，阐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他大概的主张，是要有风骨有宏敞之气，多任自然，下笔大方，要除儿女之情，要多有悲壮风云之意”^①。其主旨仍在远绍《诗》《骚》。从另一层面观察，虽然元代诗赋创作式微，但诗人创作，仍以远师《诗》《骚》为法。明人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载元代诗人卢挚论作诗曰：

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夫诗发乎情，止乎礼义。^②

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元代诗人和诗论家的一种基本的共识。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评价元代四大家杂剧和散曲创作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自然”是说其语言及音韵形式，学者们认为杂剧语言多用“比兴”，散曲的语言及技法则继承了“赋”，多用白描；^③周德清所说的“有补于世”则是评其主题，而这正是“诗骚传统”的精髓所在。元代人或明清学者常以“乐府”指散曲，一些散曲的别集或选本如《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乐府新声》《乐府群珠》《小山乐府》《月湖今乐府》等，均以“乐府”名之；明代张楚权、张旭初所编元人散曲集《吴骚合编》，则径称之为“骚”。足见元明时代作家、批评家远绍“诗骚”的用心所在。

直至近世，诗人作诗，仍以《诗》《骚》为准则的。如马一浮言：“言之精者为诗。诗言志，最要是心术正大，方可学诗。学诗必从《三百篇》《离骚》、汉魏乐府、建安七子以及《文选》诸诗入手，方有法度。”^④因为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演变中的开端地位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从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在文体形态、创作方法和审美格调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基础。

第二，思想层面。在文学和其它精神领域诸产品融而未分的先秦时期，《诗》《骚》以艺术化的形式形象地表述了古典时期的智者通过长期实践积淀而成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生价值和思想观念，其中除了自强、爱国等思想之外，还有其

它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源。胡适曾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以叫他作诗人时代。”他还根据《诗》篇，把当时的思想分为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认为从《诗》中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经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的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⑤。陈来也指出：“《诗》是春秋文化中最为突出的要素。春秋时代，习诗诵诗是士以上阶层的最重要的通识教育科目。”^⑥也可以说，产生于前诸子时代的《诗》，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学术背景。张丰乾归纳说：“儒墨两家尊崇《诗》《书》，均以《诗》《书》是古代圣王的心血结晶，可以作为言行的依据和批判现实的标准。《老子》《庄子》中的核心概念和《诗》有内在的联系，其中《庄子》多以鸟兽鱼虫为喻阐明哲理，独与《诗》相契合。法家虽然严厉批评《诗》《书》于耕战无益，甚至是扰乱人心的祸首，但也从反面证明他们意识到《诗》《书》有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商鞅时代的赵良连续引《诗》，批评商鞅变法的积弊，韩非子则引《诗》以证君主的绝对权威和不必事必躬亲的原则。”^⑦不仅先秦诸子如此，秦汉以后的历代文人作家也总是立足他们当时的时代需要，通过对《诗》《骚》的解读和阐释完成自己的人格建构，完成自己时代的人格认同与文化认同。

比较来看，《诗》《骚》传统的思想层面，在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反而要比文学层面更为深刻。《诗》是春秋时期的士君子日常生活、道德实践、政治实践的最高准则——礼——的艺术表述。而屈原生当战国之末，不仅深于《诗》学^⑧，而且还兼收并蓄儒、墨、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而能独出机杼。其《离骚》拈出“美政”、常礼尚贤、立法崇德、尊仁尚义、讲信修睦……大有整齐诸家之趋势。不仅如此，诗中还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代悲剧和人生悲剧的消解方式。屈原的《天问》则针对天地宇宙、日月星辰，以及既往的历史兴亡、人生遭际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表现了诗人深刻的哲思与大胆的质疑精神。

第三，人格层面。《诗》《骚》蕴含着丰富的人格内涵，树立了光辉的人格典范。秦汉以后，

盛世注《诗》传《诗》，乱世注《骚》拟《骚》，成为一种《诗》《骚》接受的固定模式。在《诗》《骚》的传播中，也形成了一个人格形象的意义层面，那就是为人须积极有为、关注现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诗经》来说，《商颂》中刻划了积极有为的开国之君商汤的形象和努力开疆拓土的武丁形象；《大雅》中的周民族史诗则赞美了周人圣哲睿智的先祖后稷，率领族人不畏艰辛长途迁徙的公刘，深谋远虑、德能服众的文王，勇挑重任、死而后已的武王等英雄；还有《大雅》《小雅》诗篇中所写的那些忠于国家、堪为万邦之宪的忠良之臣如周公、南仲、尹吉甫、芮良夫、卫武公等。^⑤即使是十五《国风》，也尽显“君子”的文质彬彬、“淑女”之温婉贤静。他们的人格形象随着《诗》的传播，对古代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礼记·经解》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说的就是《诗》对后人人格的影响。

《离骚》等屈原的作品中，融入了屈原的理想、情感和生命，是屈原的心灵自传和自画像。司马迁《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称赞屈的人格：“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东汉的王逸也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⑥从屈原死后，唐勒、宋玉、景差等人的追慕屈原开始，历代诗人都被屈原的人格所打动。关于这一点，仅从历代诗人持续不断地模拟骚体以创作，以及在诗作中对屈原事迹人格的歌咏当中就可以看出，此处不繁举。

中国古代德艺并重，论诗先论人品德行。如徐干《中论·艺纪》言：“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盛德之士，文艺必众。”^⑦刘熙载《艺概·诗概》则说：“诗品出于人品。”这类例证很多，不繁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骚》传统中的人格之美，才受到历代诗人的重视，从而使其成为不断取资的创作源泉。

三 “诗骚传统”的当下意义

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因全球化和技术

文明的双重重压而举步维艰之时，一些有识之学者倡导通过重新审视和发现经典的价值以重新树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⑧一部分作家也在尝试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通过创作完成中国文学民族性与审美性的复归。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下，历史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杜维明赞同梁启超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定为四个方面：首先，要以尊崇和保护中国文明为真诚目的；其次，采取西方方法研究中国文明并找出真正的特点；第三，重整中国文明并用其他文明加以补充，如此将其转化并变成一种新文明；最后，将此新文明伸展到外部世界，如此可有益于全人类。^⑨胡适也主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功夫），一是“研究问题”，二是“输入学理”。具体到文学研究，“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⑩著名学者陈世骧兼通中、西文学，他立足中西比较，对《诗经》与《楚辞》为代表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归纳，可以说是梁启超、胡适研究思路的一个具体实践。陈氏指出：

歌——或曰：言辞乐章（word-music）所具备的形式结构，以及在内容或意向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自抒胸臆（self-expression），是定义抒情诗的两大基本要素。《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把这两项要素结合起来，只是两要素之主从位置或有差异。自此，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航道确定下来了，尽管往后这个传统不断发展与扩张。可以这样说，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注定要以抒情为主导。抒情精神（lyricism）成就了中国的文学的荣耀，也造成了它的局限。^⑪

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而其原生的、足为范式的作品就是《诗经》和《楚辞》。这是他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是在伟大的传统之间寻找差异和相同或者互通的地方”这一学术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所得的结论。本文揭示“诗骚传统”，也正是承其用意。

本文所说的“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实践的品格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之疾患的良药，也可以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我们反对复古，但呼吁民族文学对古典精神的回归。

认识诗骚传统的当代性，即是对其进行价值

判断。而欲权衡其价值,首先要厘清诗骚传统的内在价值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创作和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之间的契合度。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文化旅行和交往日益增多,文化的多元性和混杂性越来越显著。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广义的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因为其重现和表征着“我(们)”的形象,因而成为认同的重要手段和场域。^②诗骚传统所表征的三重内涵,以及忠、信、仁、义、孝、和、智、勇等伦理规范和进退去取的人生实践策略在当代社会中恰恰可以担当起民族认同与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责任。

多年以前,雅斯贝斯既已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精神已经被用作手段。其结果便是精神的沉沦。他说:“如此,它便变得非常灵活,成了诡辩的单纯工具,可以服务于任何主人。它为任何一种事态寻找理由,只要这事态是现存的或为既有的权力机构所希望的。不过,精神始终明白,只要它是按照这类方式起作用的,它的作用就不会得到认真的看待。当它用虚构的信念来求得情感效果的时候,就表明了它的这一隐秘的自身认识。”^③而人的真正的意志却因此而被摧毁。“如果生活继续被看作为群众提供普遍的生活必需品秩序或系统,那么,精神在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中所具有的这种虚伪,就会因其对于人的可能性的歪曲而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④雅斯贝斯所描述的这种西方社会精神的普遍状态,也适用于描述当代中国混合文化与缺乏精神指引的文学所表征的精神危机。

前文已经指出,“诗骚传统”既启迪了先秦诸子,又是对传统儒、道哲学中价值系统的有效提炼与综合,同时还是通过《诗》与《离骚》在历代的传播对其进行由哲学向日常生活层面的落实。这使其影响的范围和效力大大拓展。关于这一点,陈世骧立足《诗经》《楚辞》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研究,以及用由此概括出的“诗骚传统”在源头、形式和功用三个方面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评论,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他认为,汉唐以后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和作家都“有不断传下去的历史感”;大多数作品具有启迪思想、教育

民众的实际作用。这都是因为文学创作继承了由《诗经》《楚辞》所树立的“抒情传统”的结果。^⑤此外,夏晓虹《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一书,则更是拉长战线,对诗骚传统在历代文学革新中的启示意义所进行的深入剖析^⑥,其观点富有启示意义。循其思路以探索诗骚传统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创作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弘扬《诗》《骚》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文学与文化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内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特别是两周时期盛行的“诗教”思想,更是突出了《诗》的教化功能。体现出政治的艺术化倾向。梁启超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以为良好的政治,须建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而民众之本质,要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不断的保育,方能向上。故结果殆将政治与教育同视。”^⑦《诗》多载圣贤的前言往行,多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为儒家伦常规范所自出,故儒家以《诗》为教。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力求附合实际的、辩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⑧,也是人文精神中最为可贵之处。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释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知勇、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并主张和谐的人生哲学,亲近自然,对世俗生活的超然态度,对人的异化的自觉抗拒等。

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历代文人解读《诗》的活动,就是在人生观上对儒家思想的立足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认同与选择。安贫乐道,不苟活,不轻死。^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

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被儒家作为经典，正是因为其中渗透着古典精神。用孔子自己的话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可以经夫妇，成人伦，美孝道，厚风俗，成教化。他还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体现出“思无邪”的特点。孔子在教学中善于借助于对《诗》的阐释而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如《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所引的两句诗出自《卫风·淇奥》篇，原意是形容一个人刻苦修德犹如玉工雕刻象牙和美玉一样切磋琢磨，精益求精。在这里，孔子师生二人谈话赋予了诗句以新的意义：即在进德修业中应当精益求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说《诗》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同时，加上儒家对它的再阐释，就使得《诗》成为古典时代儒家思想的载体。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其中的一些思想意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和心理积淀的一部分。

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在哲学层面上更多地带有综合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某些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屈原在作品中所展示的诗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在心灵悲剧的消解方式上，屈原创造了一种高不可及的范式。正因为这一范式的高不可及与不可模仿性，所以历代文人每每可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发现“歧意”，并借以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实存。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而受其影响的作家，便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

神的承担者。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哈威·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曾经这样定位历史研究的功能：“历史还有一件应该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①这一思路应当也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立足当下的文学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可以开始对古典精神的回归之旅。我们可能虽然领悟但却永远无法达到它所代表的这个高不可及的典范，但有理由相信，在回归之旅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回我们民族文学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①参见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及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李昌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②学者们对“诗骚传统”虽也有所论述，但均未将其视为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也未对其内涵和形成过程及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如许结《诗骚传统与汉代文学思想的建构》（《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只对诗骚传统对汉代文学思想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夏晓虹《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虽涉及“诗骚传统”对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的影响，但仍未涉及“诗骚传统”的形成及内涵等有关核心问题。

③《商颂》五首的作年过去学者多以为在春秋之时，近二十年以来有关《商颂》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从词汇、礼仪制度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大多以为《商颂》是商代旧歌。详参陈炜湛《商代甲骨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江林昌《甲骨文与商颂》，刊《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

④《国语·周语》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引《诗》曰：“《颂》曰”云云，是其证。

⑤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⑥特里·伊格尔顿在2012年出版了新著《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引发了国内关于“作为事件的文学”的讨论，其中涉及文学经典化的路径问题。详参马汉广《作为事件出场的文学及其当下形态》（《文艺研究》2017年第4期）。笔者认为，《诗》《骚》就是“作

为事件的文学”的典型，其文学观念与文类的生成正是由其关联的“事件”所赋予的，其经典化也由此而完成。

- ⑦李泽厚 《美的历程》，第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重印本。
- ⑧褚斌杰 《楚辞要论》，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⑨李泽厚、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第346—35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 ⑩张侃、韩高年 《屈原发愤抒情的美学特质及影响》，《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 ⑪朱光潜 《诗论》，收《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7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 ⑫董仲舒 《春秋繁露》，凌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
- ⑬⑭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2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⑮⑯⑰郁沅、张明高编选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351页，第325页，第50—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 ⑱方孝岳 《中国文学批评》，第19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 ⑲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第131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 ⑳邓绍基主编 《元代文学史》，第32—36页、第302—3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 ㉑丁敬涵编著 《马一浮诗话》，第5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 ㉒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34—3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印本。
- ㉓陈来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第166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 ㉔张丰乾 《〈诗经〉与先秦哲学》，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㉕参考胡适 “《诗》蕴含革命思想”的观点，结合屈原力主变法、实行“美政”的生平事迹，及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现实、人生的质疑精神来看，屈原不仅继承了《诗》的创作方法，也继承了《诗》的革命精神。
- ㉖孔颖达 《毛诗正义》言：“《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专一国，故次于众国之后，《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诸国之例也。”《大雅》之《桑柔》写芮良夫劝谏周厉王之事 《大雅》之《江汉》《常武》，《小雅》之《六月》《采芣》《出车》等诗叙写周宣王中兴时代尹吉甫、南仲、召伯虎等杰出人物率军抗击淮夷及玁狁入侵之事迹 《小雅》之《宾之初筵》《抑》赞美卫武公之美德。
- ㉗洪兴祖 《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第37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 ㉘有感于此，《文学遗产》编辑部发起“经典与当代价值”笔谈，学者们就“文学研究者的现实使命与历史使命”发表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详见《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 ㉙杜维明 《反传统、整体观、耐心谨慎：关于当代中国学术思想追求的个人反思》，收《道·学·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第20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 ㉚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初刊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见《胡适讲国学》，第1—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 ㉛陈世骧 《论中国抒情传统》，收入张晖所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第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 ㉜周宪 《文学与认同》，刊《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 ㉝③④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第87页，第8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 ㉞详参谢朝枢 《断竹·续竹·飞土·逐穴——访陈世骧教授谈〈诗经〉、海外〈楚辞〉、台港文学》，原刊台湾《明报月刊》1971年8月，收入张晖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第395—4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㉟夏晓虹 《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㊱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第7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 ㊲张岂之：《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飞鸟集》，第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 ㊳《论语·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又《里仁》：“子曰：朝闻道，昔死可矣。”《卫灵公》：“志士仁人，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 ㊴[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 《新史学》，齐思和译，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秀臣